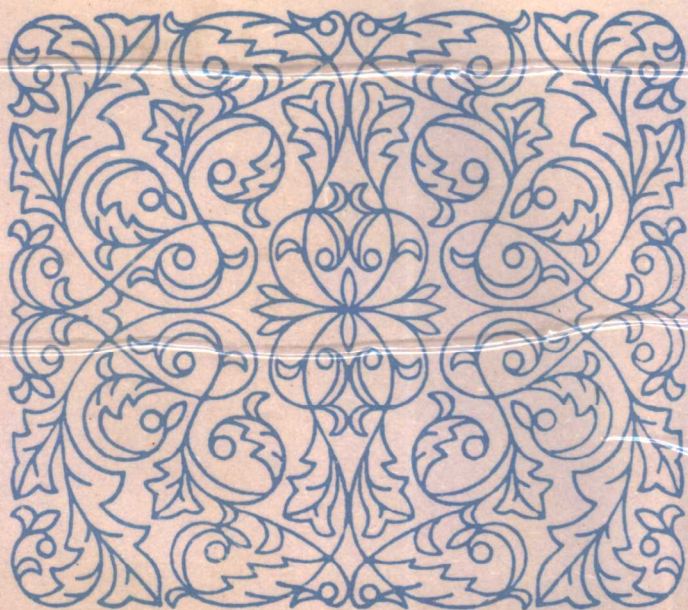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51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五 1

雜著 文學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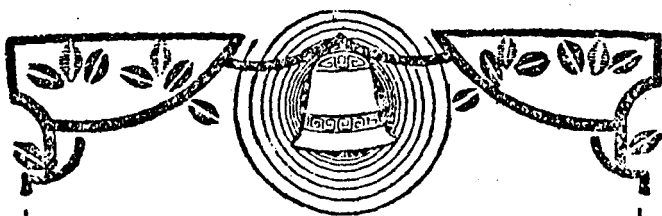
文章概論
文章學纂要

汪馥泉著
蔣祖怡編著

上海書店

蔣祖怡編著

文
章
學
纂
要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渝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一版

國學叢文
章學纂要

全一冊 實售國幣三元二角
(外埠酌加運費函費)

編著者	蔣祖怡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1455)

國學彙纂編輯例言

一、我國學術文藝，浩如煙海；博稽泛覽，或苦其煩；東搏西撈，復病其雜。本書彙纂大要，別爲十種，供專科以上學子及一般程度相當者，閱讀參考之資，庶於國學各得其門，名曰國學彙纂。

二、文章所以代口舌，達心意，爲人人生活所必需；而字句之推敲，章篇之組織，意境之描摹，皆有賴於文法之活用，修辭之技巧；至於駢散之源流，語文之溝通，亦爲學文章者所應諳悉。述文章學彙纂。文體分類，古今論者，聚訟紛紜；而各體之特徵、源流、作法，更與習作有關；爰折中羣言，闡明體類，附論風格，力求具體。述文體論彙纂。

三、研讀古籍之基本工夫，在文字、目錄、校讎之學。我國研究文字學者，聲韻形義，歧爲兩途；金石篆隸，各成系統；輒近龜甲之文，簡字排音之說，益形繁雜；理而董之，殊爲今日當務之急。而古籍文字訛奪，簡編錯亂，書本真偽，學術部居，校勘整理，尤當知其大要。述文字學彙纂及校讎目錄學彙纂。

四、我國古來文藝以詩歌小說爲二大主流，戲劇則曲詞照育於詩歌，劇情脫胎於小說。而

詩歌之演變，咸與音樂有關，其間盛衰遞嬗，可得而言。至於小說，昔人多不屑置論，輒近國外文學輸入，始大昌明。而話劇亦駉駉奪舊劇之席。述詩歌文學纂要及小說纂要。

五、我國史書，發達最早，龐雜最甚，而史學成立，則遠在中世以後；且文史界限，迄未釐然；至於諸史體製，史學源流，亦罕有理董羣書，紬繹成編者。是宜以新史學之理論，重新估定我國之舊史學。述史學纂要。

六、我國學術思想，以先秦諸子爲最發展，論者比之希臘，有過之無不及也。秦漢以後，儒術定於一尊，雖老莊玄言復昌於魏晉，而自六朝以至五代，思想學術，俱無足稱。宋明理學大盛，庶可追跡先秦，放一異彩。述諸子學纂要及理學纂要。

七、六經爲我國學術總會。西漢諸儒承秦火之後，興滅繼絕，守先待後，功不可沒。洎其末世，今古始分。東漢之初，爭論頗劇。及今古混一，而經學遂衰。下逮清初，始得復興。乾嘉之學，幾軼兩漢。清末今文崛起，於我國學術思想之劇變，關係亦頗切焉。述經學纂要。

八、軍興以來，條已四載，典籍橫舍，多被摧殘，得書不易，讀書亦不易。所幸海內尙存乾淨土，莘莘學子，未輟弦歌。編者局處海隅，自慚孤陋，縱欲貢其一得之愚，罪戾紕繆，自知難免，至希賢達，予以匡正！

目次

[illegible]

第一章 緒 說

「文章」兩字底本義，即「彰彰」，是文彩的意思。考工記：「青與白謂之文，赤與白謂之章」。許慎說文解字中也說：「文，錯畫也；象交文」。都是解釋作文彩的，後來引申作「文辭」講，和「文采」兩字一樣。禮樂記：「廣其節奏，省其文采」。疏：「文采，謂樂之宮商相應，若五色文采」。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亦作「文辭」解：「文采不表於後世」。現代所用，都是它們底引申義。「文采」「文辭」「文章」三者底意義是相近的。

史記孔子世家：「約其文辭而指薄」。杜甫詩：「平生感意氣，少小愛文辭」。文章是代表語言的，所以也可以稱作「文辭」。論語中說：「辭達而已矣」，即以辭代「文章」；左傳中也有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」的話，它將「言」和「文」混在一起講，可見文章和語言關係之密切了。我以為三代以前言語和文章一致，語文並不分途，這也是一個證據。

由此看來，文章和天分有關，也和個性有關。清代主張「性靈說」的袁枚，便以為鄉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辭，有的也是「絕妙好辭」，並不一定要博學通儒纔能夠做出來的。他

說：「有讀破萬卷不得其間奧者，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，雖李杜復生，必爲低首者」。照他底話看來，我們不必學做文章而寫出來的一定非常佳妙了。但是這又不盡然。我們不是天才，不能捨棄了規矩方圓而單重靈感，因此，也不能忽略於作文方式的探討的。

古人常常以爲文章之道是非常奧妙的，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，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」。古人說：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」。爲什麼在他們眼光裏看來，文章是如此神祕的東西呢？這不外乎兩個原因。第一，因爲他們作文的目的是學古，脫離了現實而專擬古人，便難以逼真，不能逼真；便慨然興嘆，說文章之不易作了。揚雄在他底解難中說：

「昔人有觀象於天，視度於地，察法於人者。天麗且彌，地普而深。昔人之辭，迺玉迺金」。

因爲「昔人之辭，乃玉乃金」了，便不得不造法言來學論語，造太玄來學易經。法言中又說：「不合乎先王之法者，君子不法也」。也是這個意思。明代是專事擬古的時期。王世貞在他底藝苑卮言中提出他底模仿論道：

「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，吾始甚狹之，今乃信其然耳。記聞既雜，下筆之際，自然於筆端掇擥，驅斥爲難。若摹擬一篇，則易於驅斥，又覺局促，痕跡宛露，

非斲輪手。自今而後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；日取六經、周禮、孟子、老、莊、列、荀、國語、左傳、戰國策、韓非子、離騷、呂氏春秋、淮南子、史記、漢書；西京以還，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作者，熟讀誦泳之，令其漸漬汪洋。遇有操觚，一師心匠，氣從意暢，神與境合，分途策取，默受指揮；臺閣山林，絕迹大漠，豈不快哉！？

這種刻意求古之說，明代最爲盛行，所以諸代侯方或底壯海堂文集評論他們：

「明三百年之文，擬馬遷，擬班固，進而擬莊列，擬管韓，擬左國公穀，擬石鼓文、穆天子傳，似矣；卒以謂唐宋無文，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，而中無確然自信者矣」。

第二，以爲文章是「敷讚聖旨」的工具，因此文章便成爲一種至高無上的東西，而「神而明之」了。「敷讚聖旨」之說，始於劉勰。文心雕龍序志篇中說：

「敷讚聖旨莫若注經，而馬鄭諸儒，宏之已精；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。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」。

到了唐代，韓愈乃益張其說，以爲「愈所能言者，皆古之道」，「文宜師古聖賢人」，「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」。新唐書藝文志中也說他「擢嶠道真，誦泳聖涯，韓愈倡之」。宋

代歐陽修也有類似此種冠冕堂皇的話。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說：

「蓋文之爲言，難工而可喜，易悅而自足。世之學者，往往溺之。一有工焉，則曰吾足矣。……孔子老而歸魯，六經之作，數年之頃耳。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。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，荀卿蓋亦晚而有作。後世之惑者，徒見前世之文傳，以爲學文而已，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。若道之充焉，雖行乎天地，入於淵泉，無不之也。」

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「窮理致用」爲文章的功用。「夫士之於學，所以窮理而致用也」。清代方苞倡「古文義法」之說，更強調了這種傳統觀念。他與申居謙一書中說：

「古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，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。韓子有言：『行之乎仁義之方，游之乎詩書之源』。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，而非後世文士之所可比也」。

自從歐陽修以後，這種觀念直深入於人心。卽自以爲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國藩，也不免有此成見。這也和帝制時代的環境很有關係。他說：

「古之知道者，未有不明於文字，……所貴乎聖人者，謂其立行與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，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。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，亦藉此文字，以考古聖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」。

自古迄今，一直相傳，認爲這種說法是顛撲不破的大道理。因此認爲做文章是一件非

常艱深偉大的工作。因為這種工作是和聖賢之道有關係的。

由於上面這兩種原因，文章變成爲至高無上而神妙莫傳的祕寶。於是字字就有其出典，語語求其神似古人底語氣。文章既然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，便應該和它發生聯繫，爲什麼還要唯古是求？爲什麼一定要使它成爲「體聖」「載道」「窮理」的工具呢？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中說得好：「夫六典三禮，所施則有地；吉、凶、賓、嘉，用之則有所。夫聞吟咏性情，反擬內則之篇；操筆寫志，更摹酒誥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歸藏，湛湛江水，遂同大傳」。唐劉知幾底史通言語篇中有更精闢的意見：

「夫三傳之說，既不習於尚書；兩漢之制，又多違於戰策。足以驗毗俗之遞改，知歲時之不同。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，記其當時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，方復追效古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丘明者，卽徧摹左傳；愛子長者，則全學史公。用使周秦言辭，見於魏晉之代；楚漢應對，行乎宋齊之日；而僞修混沌，失彼天然。今古以之不純，眞僞由其相亂」。

他所論言語文章之關係，甚爲明確。從此可知專事學古的不應該了。至於文章之用既以代語言，自然必須言之有物。從「爲藝術而藝術」，以進於「爲社會而藝術」，文章應跟着時代潮流走，這是毫無疑義的事。但所載之物，是否必爲聖賢之道，卻是值得研討的一個問題。如果一切「體聖」之作，方可稱爲文章；如果一切「擬古」之文，方可稱爲文

章；那麼文章和語言便成爲不相關繫的東西了。而宋儒又何以有「工文則害道」的話，而有「語錄體」的寫作？所以後世「典雅」兩字，害了許多人，使文章變成了晦澀。提倡音韻之說的沈約也有文章當從「三易」之說。白居易元稹也求造語平易。至明代公安竟陵更進而有「我寫我口」之主張。自黃憲憲出而有以詩寫近事不復作拘迂的議論。他底雜感五篇之一云：

「大塊鑿混沌，渾渾旋大圓，隸首不能算，知有幾萬年？羲軒造書契，今始歲五千，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。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，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，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黃土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！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明窗做琉璃，高爐爇香煙，左陳端溪硯，右列薛稷箋，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編，五千年後人，驚爲古斑斕！」

這些話，一般「以文蔽道」「以古爲事」的文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的。但是一般人對於文章始終以爲是使自己揚名萬世的工具。如魏文帝所說的「文章者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騰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」，竟將寫文章當作一件包羅萬象的偉大工作了。其實文章是代口舌的，是抒發自己底思想與感情的，

只是日常生活上一個不可缺少的項目。它底功用倒不在「經綸宇宙」和「名傳萬世」。他們既將它估計得太高，便供奉之如神明，反而失卻了文章本來的目的。

因此，古人不常用科學的方法來衡量文章，論作文，也只是談到一點抽象的議論。最常見到的是「文氣」的議論，以爲文氣與學問有關。其實所謂「文氣」即是語氣。文章底流利和曲折與語氣有關係。「文氣」底流利，即語氣的順利；「文氣」底強弱，也和語氣之輕重成正比。自從言語文章分爲兩途之後，於是這兩者也就分了家；然而兩者的關係卻是存在的。曾子說：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」，明明是指語氣而言的。孟子說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，以「氣」和「知言」並論，也指語氣的。三代以後，言語文章分爲兩途，於是有了「文氣」之說。魏代三祖論文，如「徐幹時有齊氣」「孔融體氣高妙」，即是現代所說的「風格」。典論中始有專論「文氣」的一節話：

「文以氣爲主。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，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」。

這裏所謂「氣」，即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中的所謂「風骨」，李白詩中的「蓬萊文章建安骨」。

《文心雕龍風骨篇》：

「昔潘勗錫魏，思摹經典；羣才稍隸，乃其骨體峻也。相如賦仙，氣號凌雲，蔚爲辭宗，迺其風力適也。……故魏文稱『文以氣爲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

致」。故其論孔融則云「體氣高妙」，論徐幹則云「時有齊氣」，論劉楨則云「有逸氣」。公幹亦云「孔氏卓卓，信含異氣，筆墨之性，殆不可勝」。並重氣之旨也」。足見魏文帝所謂「氣」即是「風格」了。鍾嶸詩品又稱作「風力」。名稱雖異，而所代表的意念是相同的。文心雕龍中另有養氣一篇，和前面的幾說不同，和後代所謂「文須養氣」之說相近。「夫耳目鼻口，生之役也；心慮言辭，神之用也。率志委和，則理融而情暢，辯礪過分，則神疲而氣衰」。又論養氣的方法道：

「思有利鈍，時有通塞，沐則心覆，且或反常；神之方昏，再三愈黷。是以吐納文藝，務在節宣；清和其心，調暢其氣。煩而即捨，勿使壅滯。意得則舒懷以命筆，理伏則投筆以卷懷；逍遙以針勞，談笑以樂倦；常弄閑於才鋒，賈餘於文勇，使刃發如新，腠理無滯，雖非胎息之遺術，斯亦衛氣之一方也」。

到了韓愈談文氣便抽象化了。他說：「氣，水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，亦猶是也；氣順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」。他底門人李翱也本其說道：「義深則意遠，意遠則理辨，理辨則氣直，氣直則辭盛，辭盛則文工」。而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中更有許多玄妙的議論，所謂「平氣」「矜氣」「厲其氣」等等，完全在說抽象的話了。他以爲「氣」和「道」是一件事。此外關於養氣的話很多，但終於逃不出那末一套。而所謂修養，也無非是要參透聖人之道，所謂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」，「不蓄道德，不能

「工文章」，「文章當從六經來」，「文者所以明道」，如此而已。元元好問論詩，「鴛鴦繡出從石看，不把金鍼度與人」。自己對寫作有了經驗，而祕不告人，這幾乎是古代文人的習慣了。

試將歷代論文章的專著加以研討：最早的要算劉勰的文心雕龍了。這書上半冊說文章的體制；下半冊說到作文上底幾個原則。裏面有許多特殊的解。同時又有下防文章緣起，現存者已非原本。此外，宋陳騭有文則，李耆卿有文章精義，元王構有修詞論衡，陳騭曾有文說；明方以智有文章薪火；清劉熙載有文概；它們底缺點或是空洞的理論，或是缺乏系統。專論作文中一部分問題的，如明代盧以緯底助語辭；清王濟底虛字啓蒙；王引底經傳釋詞。這些又嫌太專。光緒二十四年，馬建忠底馬氏文通問世，是中國第一部討論文法的專著。以古代文辭作文法上的檢討，這不能不說是以科學方法解剖文章的一冊偉構。但是偏於文法，也嫌範圍太小。近年以來，文法、修辭均已成為獨立的一種學問。而學者又大抵拘於成法而不知變。其他論文章作法之書，也是「汗牛充棟」，其中有的等於文體論，或者專論作文中一個問題，有的也只是抽象的議論。

固然，文章是變化多端的東西，一定要用什麼法則來衡量，似乎太笨拙。但是按之古今文章及評論文章的話，歸納出一個原則來，也未嘗不可以。近代有人頗主張廢去一切的文法修辭及文章法則，以為這些都有害於性靈的，應該以「拈花微笑」的妙悟方式出之。